

《隆中对》的成功与失误

梁满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预见到天下三分的未来,指出了实现天下三分的途径,提出了“兴复汉室”的长远任务,这是它的成功之处。“跨有荆益”是它最大的失误之处。

关键词:《隆中对》;三国;诸葛亮

中图分类号: K2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854(2007)06—0056—07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一篇对三国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的策论文章,为后来的治史者不断地加以研究认识。在各种认识和看法中,有两种意见是较为偏颇的。一种认为,诸葛亮是先知先觉者,《隆中对》是充满天才的构想,只是刘备不听诸葛亮的话,才导致诸葛亮后来“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还有一种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是没有任何条件可以支助实现的主观愿望,他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之后,仍照旧执行他二十多年前的战略设想,实在是不度时宜,强而为之,可以说是聪明人干了糊涂事,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不正确的。如何认识诸葛亮及其《隆中对》呢?认识《隆中对》首先要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诸葛亮不是神,他是一个品德出众、智谋过人、治国有方、治军有才的人。正因为如此,《隆中对》作为刘备集团的指导性的政略和战略方针,既体现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以及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部分正确预见,但同时又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

一、《隆中对》的成功之处

《隆中对》是著名的古代策论文章,它飞扬的文采、完美的形式与其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论述一样著名。让我们完整地领略一下它的风采: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1]《蜀书》卷5《诸葛亮传》

这篇长三百多字的策论文章有以下四个内容:

第一,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预见到天下三分的未来。诸葛亮在隆中向刘备讲这番话时,三分的局势并不十分明显,江东地区有孙权,黄河流域有曹操,关中地区有马腾、韩遂,汉中地区有张鲁,益州有刘璋,荆州有刘表。而刘备呢?当时只是一个只有几千人马的荆州客居者而已。诸葛亮提到孙权、曹操,肯定了他们是当时天下的两极。他也提到了刘璋、刘表,但指出他们少志暗弱,必不能自守其地,荆、益二州必易其主。对于张鲁,诸葛亮只是轻描淡写一提而已,对马腾、韩遂则未提及,显然,在诸葛亮眼里,他们不但够不上天下的第三极,甚至比起刘璋、刘表来也算等而下之了。诸葛亮眼中的第三极在哪呢?从他对刘

备的态度,从他为刘备建立霸业出谋划策的《隆中对》来看,显然是认准了刘备是堪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第三极。

第二,指出了实现三分的途径,这途径用四个字概括就是“避实就虚”。具体地说就是不与曹操争锋,不图谋取孙权。这个策略,是建立在对曹、孙两家力量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是把曹、孙两家作为天下两极看待而作合乎逻辑的选择。与谁争锋,图谋谁呢?图谋荆州刘表,并与益州刘璋争锋。只要据有荆州,刘备就有了发展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基础,就有了谋取益州的根据地;只要跨有荆州、益州,天下三分的局面就形成了。避开曹、孙,谋取荆、益,这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选择,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选择,是明智的选择,是当时唯一有望成功的选择,也是《隆中对》最核心的要点。

第三,规划了建立霸业的战略和政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了建立霸业的思想。儒家思想认为,尧、舜、禹三代是以王道治天下,这是儒家政治的最高层次。三代以下,霸道渐兴,其特点是注重实力、武力、权力。诸葛亮之所以提出要建立霸业,是因为他十分清楚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央集权瓦解的时代,一个地方实力派争夺地盘的时代,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一个只能谋求局部统一,再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时期。在这个时代中,能取得局部统一,在政治上具有权力,军事上具有武力,经济上具有实力,就是实现了霸业。曹操起家最早,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上兴屯田以实军资,军事上拥有雄兵数十万,可谓早就成就了霸业。孙权已历江东三世,政治上已根深蒂固,经济上“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军事上“兵精粮多,将士用命”^{〔1〕}《吴书》卷《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异人辐辏,猛士如林”,^{〔1〕}《魏书》卷6《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也可谓霸业已成。在这种情况下,刘备要成就霸业,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具体的政略和策略。《隆中对》对此是这样规划的:跨有荆益,利用荆州、益州的人力、物力建立雄厚的经济、军事基础。安抚荆州、益州南方的少数民族,稳定南中,开发南方,同时内修政理,建立稳固的统治。对外与孙权结好,建立孙、刘联盟,共同抗拒曹操。可以说,这是刘备建立霸业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的策略。

第四,提出了“兴复汉室”的长远任务。前面我们曾说过,诸葛亮的“兴复汉室”,不是要兴复桓、灵之世的汉室,而是光武帝时期那样强大、统一、安定的兴盛之世。兴复汉室最实质的内容是恢复统一,所以,兴复汉室既是号召天下的口号,也是诸葛亮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因为它是个长远目标,所以诸葛亮在谈到这点时并未曾详细规划,他只是说待“天下有变”,从荆州、关中两路出兵夹击中原,灭掉曹魏。天下有变的具体内容是指什么?诸葛亮也不可能说得很具体。况且,即使是真的两路夹击中原成功,也还有与孙吴的关系问题,再下一步如何谋求全国统一,更是难以具体预见。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英明的君主,这些君主手下有更多的谋臣智士,或君主向臣下问策,或臣下主动献计,便产生了数不清的策论文章。在这数不清的策论文章中,像《隆中对》这样的文采飞扬、结构规整、组织严密、内容丰富、具有深刻预见性的佳作却寥若晨星。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智者,《隆中对》是古代政论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预见性。关心未来是人们普遍的心理,尤其是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发展前景如何?未来命运如何?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所以,汉末三国时,人们尤喜爱预测未来。官渡之战前,袁绍临出征前,他手下的谋臣沮授就把宗族之人召在一起,把自己的资财积蓄分给他们说:“夫势在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宗人不明白沮授为何如此伤感,有人就说:“曹公兵马不敌,君何惧焉!”沮授却说:“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公孙(指公孙瓒)众实疲弊,而将骄主怙,军之破败,在此举也。”^{〔1〕}《魏书》卷6《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沮授在袁强曹弱的情况下,却预见到了袁绍破败,比起他的宗人来,可谓有预见性。颍川人荀彧,在董卓之乱时辞官回乡,对家乡父老说:“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里人多恋家怀土,对荀彧的预见半信半疑。正巧,颍川人韩馥作了冀州刺史,急需人才,派人前来请荀彧。而家乡的族人由于怀土,也不相信荀彧的预见,许多人都没随荀彧走,错过了逃离灾祸的机会。后来,董卓派部将李傕等人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1〕}《魏书》卷10《荀彧传》荀彧与那些未走的乡人相比,可谓有先见之明。毫无疑问,沮授、荀彧都是那个时代的智者,他们预见的准确证明了他们的眼光。但沮授所预见,是官渡之战袁绍的败局;荀彧所预见,是家乡要

遭兵乱的前途。比起诸葛亮对天下三分的预见，他们所说之事要小得多。从袁绍出兵到官渡失败，时间不到一年；从董卓进京到董卓身亡，也就三年多。而从诸葛亮《隆中对》的提出，到刘备建立蜀汉，天下三分定局，这中间经历了十多年。也就是说，沮授、荀彧所预见的是一、二年之内的事，而《隆中对》所预见的是十多年以后的事。在这十多年的时间中，天下大势的发展基本上按《隆中对》所预见的趋势进行。《隆中对》所预见之事之大，预见时间之长，预见结果之准，在当时的确找不出第二个。

第二，科学性。我们说《隆中对》的科学性，主要也是说它对天下大势预见的科学性。何谓科学？科学就是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就是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实事求是。衡量一个预见是否科学，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预见的结果要与事实发展的结果吻合，即人们通常说的“准”。另一个是提出预见的根据是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是令人信服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所预见的事物与事实发展结果不符，即使把预见的依据说得天花乱坠，也谈不上科学性。如果所预见结果虽准，但没有客观依据，或依据不令人信服，就难免有“瞎猫碰死耗子”之嫌。像这样不科学的预见在古籍记载中也很多。比如三国末期，曹魏大将邓艾受命征伐蜀汉。他梦见自己坐在山上，山上还有流水。梦醒之后便把此梦告诉殄虏护军爰邵。爰邵说：“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彖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往必克蜀，殆不还乎！”爰邵的预见是很准的，邓艾征蜀，一直打到成都，刘禅亲率众臣面缚舆榼诣军投降。邓艾果然建立灭蜀大功。但另一将领钟会密告邓艾图谋叛乱，结果魏帝下诏将邓艾逮捕，用囚车押回京城，在半路被杀死。但爰邵预见这个结果的根据是邓艾的一个梦和《周易》卦辞。爰邵的理论是：《周易》中《蹇》卦的卦形是，下面三爻是单卦艮，代表山，上面三爻是单卦坎，代表水。邓艾梦见山上有水，正合《蹇》卦。而《蹇》卦卦词是利在西南，往而有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邓艾征蜀，是往西南方向走，征蜀毕回军，是向东北方向走，所以爰邵预见邓艾征蜀是往而有功，归不生还。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邓艾之死，因为历史记载得那样明明白白。但我们有理由怀疑爰邵的理论甚至这件事的本身。因为《周易》卦词、邓艾之梦与邓艾之死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爰邵预见邓艾之死这件事，是不是人们根据邓艾之死附会的呢？

《隆中对》的预见也很“准”。诸葛亮预见天下将要分成三极，预见到刘备要成为三极之一，果然，刘备从一个兵只有几千，地没有一块的客居荆州之人发展起来了，先在赤壁与孙吴联手把曹操打败，使三分具有雏形。接着又据有荆州，向益州发展，最后建立蜀汉，使三分定局。这一切都是按照《隆中对》所预料的那样一步步变为现实的。《隆中对》预见的实现，当然和诸葛亮、刘备等人的努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隆中对》借以预见的依据符合客观规律。我们知道，个人的努力具有主观色彩，个人努力只有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才能取得预期的成功。《隆中对》预见天下三分，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曹操、孙权是当时天下的两强，曹操拥数十万大军，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有天时；孙权立国三世，据江东之险，占有地利。二者一时谁也吃不掉谁。这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毫无疑问，曹操是当时天下的最强者，孙吴想灭掉他是不可能的。当时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是曹操，但统一天下决非一朝一夕可以蹴成，当曹操一点一点地将黄河流域基本统一，欲向南发展时，孙吴已经历三世而称强于江东了。史书上曾经记载这样一件事：

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与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撤军还。

[1]《吴书》卷2《吴主传》裴注引《吴历》

这件事发生在建安十八年（213年），已是《隆中对》提出后的第六年，孙、曹谁也吞并不了谁的形势依然如此。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诸葛亮进一步认为：两强对峙，也有他们一时无法顾及的地方，这就是荆、益二州。两强各占天时、地利，也有他们未占的条件，即人和。而刘备是“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恰恰占了人和。因此，刘备完全有可能成为与曹、孙鼎足而立的第三强。《隆中对》关于天下三分的预见是准确的，其预见所凭的依据，乃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总结出来的，所以，《隆中对》的预

见性是有科学根据的。

第三, 系统性。《隆中对》不是一般的策论文章, 它是一个需要实践的、可操作的战略计划。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见到诸葛亮后, 劈头就提出一个严峻问题: “汉室倾颓, 奸臣窃命, 主上蒙尘。孤不度得量力, 欲信大义于天下, 而智术短浅, 遂用猖蹶, 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 君谓计将安出?”^[1]《蜀书》卷5《诸葛亮传》力量弱小、屡遭失败的刘备, 怎样才能战胜实力雄厚、已握朝廷权柄的曹操? 这的确是一个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回答的问题, 更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一个系统的、有步骤的战略计划。《隆中对》就是回答刘备这个问题的。

《隆中对》就是一个系统的、有步骤的战略计划。

总的看来, 申明大义、兴复汉室、实现统一是一个大系统, 它包含三个子系统: 如何对待曹操, 如何对待孙吴、如何对待自己。《隆中对》的一切内容都是围绕这几个系统展开的。对待曹操, 始终将他作为势不两立的敌人。《隆中对》的提出, 一开始就是以反对“奸臣窃命”为前提的, 这个“窃命”的“奸臣”, 就是指的曹操。诸葛亮提出不可与曹操争锋, 不是不反对他, 而是说在自己力量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时, 不要与他硬拼, 首先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在《隆中对》的最后, 诸葛亮说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 让刘备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目标还是指向曹操。对待孙吴则不可与之敌, 而是要把他作为共同反对曹操的盟友。在这三百多字的策论中, 诸葛亮曾两次说到孙吴“可以为援而不可图”, “外结好孙权”, 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对待自己, 就是要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 使其能与曹操抗衡。如何壮大自己的力量呢? 先要据有荆州使自己有立足点, 再进一步占领益州以使脚跟稳固。然后与荆、益地区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 在统治区内实行开明的经济和政治政策, 发展生产, 使自己的势力强大起来。总之, 《隆中对》是一个既有长远目标, 又有近期任务; 既有战略规划, 又有实施步骤; 既有内政外交, 又有民族政策的全面系统计划。

第四, 策略性。战略和策略是一对分不开的孪生兄弟。战略是目标, 策略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隆中对》这个整体战略计划中, 处处体现着策略: “兴复汉室”是战略目标, 也是号召天下, 争取人心的政治策略。暂时不与曹操争锋, 不与孙吴为敌, 进攻目标指向荆州、益州, 体现着避实就虚的策略。外结好孙吴, 建立孙刘联盟, 体现着联弱抗强的策略。西和诸戎, 南抚夷越, 体现着稳定后方专力对敌的策略。内修政理, 体现着自强自立以抗衡强曹的策略。跨有荆、益, 则体现着钳形夹攻中原的策略。

第五, 思想性。《隆中对》有一个熠熠生辉的思想, 就是注重“人谋”, 积极进取。刘备见到诸葛亮以前, 事业上屡受挫折。他初失意于安喜县, 又受挤于平原县, 复失徐州于吕布, 再败兵于曹操, 落得个一事无成, 寄人篱下。他见到诸葛亮后所说的那番话, 既表示自己寻求成功的急切, 又流露出几分对至今功业未成的无奈。然而诸葛亮却不这么看。他在《隆中对》一开始就以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为例子, 说明“人谋”的重要性。在官渡之战前, 曹操出身宦官, 袁绍世代公卿; 曹操将少粮缺, 袁绍兵多粮足。但曹操最终能打败袁绍, 以弱胜强, 就是因为曹操多谋善断, 捕捉战机, 坚毅果敢, 发挥“人谋”的作用。在《隆中对》中, 诸葛亮分析了刘备可以发挥“人谋”作用的有利因素: 第一是“帝室之胄”, 汉室的后代兴复汉室名正言顺, 号召力强。第二是“信义著于四海”, 比起“宁我负人, 毋人负我”^[1]《魏书》卷1《武帝纪》裴注引孙盛《杂记》的曹操, 在人民群众中影响要好得多。第三是“思贤若渴”, 这样就会延揽天下英才共成霸业。诸葛亮的这些分析, 不仅对逆境中的刘备是个极大的鼓舞, 也表现出诸葛亮注重“人谋”, 谋求变弱为强, 要从失败中崛起最终战胜强曹的积极进取精神。

以上五个特点表明, 《隆中对》是表现诸葛亮见识、谋略、智慧、毅力、风范的不朽杰作。

二、《隆中对》的失误之处

俗话说: “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尽管《隆中对》对天下大势作了周密的分析和科学的预见, 但仍有其比较严重的缺陷, 这就是“跨有荆、益”的计划。

自从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占领成都, 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后, 这个局面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先是孙吴索要荆州, 接着发生了孙吴出兵荆州南三郡之事, 刘备、孙权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虽然刘备作出重大让步, 使荆州危机暂时缓解, 但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荆州便落到孙吴之手。蜀汉“跨有荆、益”的局面, 仅仅维持了五年便宣告破产。正如三分天下的实现证明《隆中对》思想中所包含的科学

性一样，“跨有荆、益”的失败也说明了《隆中对》计划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因素。

“跨有荆、益”不合理因素在什么地方？

从地理形势上看，荆州和益州的联系远不如荆州和扬州那样紧密。益州处于长江上游，荆州处于长江中游，扬州处于长江下游，表面上看，长江像条玉带，连起了益、荆、扬三颗明珠。但实际上，益州是处在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上，荆州、扬州则同处在第三阶梯上。益州四塞险固，山峦屏障，它的西面是邛崃山、大雪山，南面有大娄山、乌蒙山，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东面耸立着巫山。四面的山犹如高耸入云的围墙，把四川盆地环抱起来，在古代交通不便时隔断了它与外界的联系。而荆州与扬州同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之上，两地之间没有天然屏障相隔，一条长江，把两州天然地联在一起。

《隋书·地理志》说，荆州的“风俗物产，颇同扬州”。这说明，由于荆州与扬州之间地理关系的密切，从而形成了经济和文化的紧密联系。对两个地区经济文化联系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交通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荆州与益州之间，交通极为不便。巫山山脉从北至南，横亘于两州之间。长江横切巫山从西向东穿过，成为贯穿益州、荆州的交通孔道。在这崇山峻岭之间，长江所过之处，两岸崖壁峭立，如斧砍刀削，形成“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2] 卷34《江水二》}的大峡谷。这个大峡谷，从益州东部重镇永安，到荆州西部重镇西陵，长达二百多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峡。三峡江面极窄，水流湍急，险滩栉比，从荆州到益州，逆流而上，有“下水（即顺流）五日，上水（即逆流）百日”之说。此外还有崖壁崩塌。据史书记载，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巫峡山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2] 卷34《江水二》}造成名为“新崩滩”的险地。此处滩石遍布，“或圆如箬，或方似屋”，给航行带来极大困难。尤其是瞿塘峡西口的滟滪滩，横锁江心，“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2] 卷34《江水二》}李膺《益州记》足使航行者望而却步。

从荆州到扬州，交通状况则大大改观，江面宽阔，水流平缓，两岸是坦荡的平原。在夏口，有个港湾曰“黄军浦”，据说是由东吴将军黄盖泊水军而得名，在东晋南朝时，又是商船汇集的地方。^{[2] 卷34《江水三》}孙吴大将吕蒙偷袭荆州时，把兵船改作商船模样，竟能得逞，骗过关羽的荆州守军，可见当时在荆、扬之间商船往来也畅行无阻。

荆州到益州，交通困难，荆州人把逆水而上视为畏途，而益州由于气候适宜，土地肥沃，资源丰饶，经济自给性强。在古代，由于险恶的交通状况的阻隔，使益州和荆州的交流受到一定的影响。

从荆州到扬州，交通便利，没有自然险阻，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基本上联成一个经济文化区域。

益州、荆州、扬州三个地区的关系如此，就使《隆中对》“跨有荆、益”的计划建筑在一个十分脆弱的基础之上。如果孙吴对荆州没有要求，蜀汉的跨有荆、益局面尚可勉强维持，一旦孙吴图谋荆州，局面马上就会改观。

问题是，从孙吴的根本利益看，它不可能对荆州放弃要求。翻开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荆州的绝大部分版图都在今天湖北、湖南两省境内。荆州的州治江陵，就在今湖北沙市西北的长江边上。而孙吴的首都建业，即今天的江苏南京，也在长江之滨，地处荆州下游。天时、地利、人和是古代军事家欲求制胜的三大因素，其中地利的因素不可忽视。对于孙权来说，处在上游的刘备既是盟友，也是一柄不知什么时候就劈下来的上方宝剑。没有荆州，孙权西部虽有门户，但钥匙却不在自己手里，孙吴没有安全感。

孙权所占的江东地区，只有江浙一带还算富庶，其它地方在当时尚未开发，经济十分落后。而当时的荆州，土地肥沃，士民殷富，有了它，就可以使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经济角度讲，孙吴也需要得到荆州。

孙吴所在的江东地区，北有强大的曹魏，就实力对比而言，向北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向西发展，占领荆州，才有可能全据长江天险，北拒曹魏。

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强弱，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安危，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存亡。荆州对下游南京的重要，东晋人何充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精彩。他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3] 卷7《何充传》}何充这里虽论述的是东晋政权与荆州的关系，但同是江南偏安政权，故也适用于孙吴政

权。荆州对孙吴如此重要,所以,争夺荆州是吴国政略和战略的基本方针。早在建安五年(200年)十月,比《隆中对》还早七年的时候,鲁肃便向孙权进献“鼎足江东”之策。他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唯有“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建安十三年(208年),鲁肃又对孙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1]《吴书》卷9《鲁肃传》}同年,大将甘宁也向孙权说:“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指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1]《吴书》卷10《甘宁传》}赤壁之战后,周瑜曾向孙权密献计说:“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指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1]《吴书》卷9《周瑜传》}吕蒙接任鲁肃之职后,也主张夺取荆州,“全据长江”,派一支兵驻江陵,一支兵驻白帝,他自己进据襄阳,以争中原。^{[1]《吴书》卷9《吕蒙传》}直至孙吴后期,名将陆逊及其儿子陆抗,仍然坚持争夺荆州的战略方针。凤凰三年(274年)陆抗临卒前上疏说:“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1]《吴书》卷13《陆逊附子抗传》}从上述一系列言论中可知,孙吴军政最高层主要决策人物及有眼光的战略家,如周瑜、鲁肃、甘宁、吕蒙、陆逊、陆抗等人都把荆州看作是吴国生存与发展的命脉。荆州与扬州紧密的联系,既是孙吴立国江东的必争之地,又是孙吴争荆州取胜的有利条件,也是孙吴争夺荆州的根本动力。正因为荆州与扬州联系紧密,所以孙吴把它视为自己的西面门户,视为关系到自己强弱、安危、存亡所系的命脉。

荆州对孙吴政权如此要,而《隆中对》又把统一大业的成功建立在“跨有荆、益”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之间迟早要进行一场“拔河比赛”,而荆州就是这根绳子的中点。刘备集团对荆、益二州的占领,并不是这场比赛的终结,而是双方已经各自握住了绳端,只等开始的哨音了。比赛虽未开始,孙吴已占据了低下的有利地势,只要一用力气,就会使中点迅速拉向自己一方。正因为荆州对吴国如此重要,所以孙吴决不会放弃这扬“拔河比赛”。

“跨有荆、益”虽然一开始就存着先天的缺陷,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就指责《隆中对》。因为诸葛亮是人,不是神。任何规划难免有其不周全和疏漏之处,《隆中对》也不例外。《隆中对》刚一提出时,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并没有发生,“跨有荆、益”的先天缺陷只是一种隐性存在,显然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随着刘备对益州的占领,孙、刘之间在荆州问题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一天天暴露出来,明显起来。孙吴的主要决策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论说荆州的重要,孙吴采取各种形式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对荆州的欲望,而刘备、诸葛亮却对此置若罔闻。特别是有了关羽丧败的惨痛教训后,刘备、诸葛亮仍然没有及时采取修正原来战略方针的措施,还要继续错下去,把蜀军主力再次投向荆州战场,这就是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了。

是什么原因使刘备、诸葛亮一错再错呢?

首先,是《隆中对》的光辉掩盖了自身的缺陷,就好像太阳本身有黑子,但因为其光芒四射,人们很难用肉眼看见一样。我们说过,《隆中对》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策论文章,它的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策略性、思想性无不闪着耀眼的光芒。刘备失掉荆州以前,十多年的历史都是按着《隆中对》所预见的方向发展着,刘备占荆州、联孙吴、取益州、夺汉中、跨荆益,一切皆如《隆中对》所料。这不免给刘备、诸葛亮等人一个错觉,他们不相信《隆中对》的策略有什么不妥之处,从来没有打算要对它进行修改。

其次,是《隆中对》的提出根本目的是为了扫除国贼,兴复汉室。这个窃命国贼就是曹操,《隆中对》所指向的斗争目标也是曹操。三分天下建立霸业是为了对抗曹操,联合孙吴是为了对抗曹操,跨有荆、益也是为了夹击曹操。因此,诸葛亮在考虑荆州问题时,主要是从蜀、魏斗争的角度出发的。当时,刘备集团内部在对待荆州问题上还有另一派意见,这就是庞统、法正、赵云等人主张的“蚕食雍、凉”,占领关中,出潼关以争天下。这些人的意见,显然是借鉴了历史的经验,走的是秦、汉统一天下的老路。诸葛亮也熟读史书,他何尝不知道秦出关中平定六国、汉出关中打败项羽的历史?然而,现在的情况,既不同于秦,也不同于汉。秦国在未出关之前,所面临的对手是六国。六国总体力量当然要比秦国强大,但很可惜,六国间

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利益,始终形不成一致的力量。比如说公元前 287 年,在苏秦的活动下,东方的韩、赵、魏、燕、齐五国联合起来,共同伐秦。这五国联合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是各怀鬼胎。苏秦主张“合纵”,是为了燕国的利益,借合纵把齐国拉入伐秦行列,以防止齐攻燕。而齐国参加合纵伐秦是为了吞并宋国,因为当时秦是宋的保护者。由于合纵五国各有各的打算,所以进至荥阳、成皋间便驻足不前,无功而散。再比如公元前 316 年,燕国内部发生动乱,齐国却乘乱对燕国用兵,攻进燕国首都,几乎将燕灭掉。后来,燕昭王即位,经过将近 30 年的发奋图强,于公元前 284 年派大将乐毅率兵伐齐,攻破齐国首都,占领七十余城。参加乐毅伐齐之战的,还有韩、赵、魏等国。这说明,东方六国互有矛盾、互相攻击,实为一盘散沙。秦国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得以胜利出兵关中,将六国各个击破。刘邦在未出关之前,所面临的对手是项羽。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又在全国范围内分封十八个诸侯王,貌似强大,其实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在分封中,项羽厚封亲信,对非亲信者,或改大为小,或远封边地,或不予分封。所以,分封刚刚完毕,未得封王的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造反。未得封王的彭越很快也成了田荣部下的将军。不久,陈余又联合田荣,赶走项羽所封的常山王张耳,另立赵王歇。赵王歇又立陈余为代王。燕王臧荼又攻杀燕王韩广,并吞并了其属地。项羽分封的格局很快被打乱了。在关中,项羽所封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任务是监视汉中王刘邦。这三个人原为秦将,欺骗其众投降项羽,结果使二十多万秦军降卒被坑杀,唯此三人得脱,又被封王关中,“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4]卷 9《淮阴侯列传》}在这种情况下,刘邦才能出陈仓一战而定三秦,占有关中。出关中后,东方诸侯又纷纷降顺,很快使项羽变成孤家寡人。

刘备、诸葛亮所面临的形势则大不相同。他们的对手,不是各顾其利的山东六国,也不是对所封之地心怀不满的各诸侯王,而是强大的、统一北方的曹操。这个对手,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拥兵数十万,经济上据有开发得最早的关东数州,可以说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最具优势的强国。对于这样一个强大对手,仅用关中一路取胜是十分困难的,因而诸葛亮认为从关中、荆州两路夹击取胜的把握要大些。仅从蜀、魏斗争角度看,诸葛亮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是高明的,但两路夹击中原所牵扯的不仅仅是蜀、魏双方。要两路夹击,必须占有荆州,而占有荆州必然会与孙吴的立国方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只要是蜀汉据有荆州,联合孙吴就是一句空话。而联合孙吴恰恰又是《隆中对》整个政略方针中不可分割的外交策略。这样,在《隆中对》整个系统中,政略方针和战略部署之间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忽略孙吴对荆州的占有要求,不能不说是《隆中对》的一个失误。

(本文关于《隆中对》失误的主要观点是朱大渭先生的,笔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挥和引申)

参考文献:

- [1]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酈道元. 水经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3]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Achievement and Error in Longzhong Strategies

LIANG Man—c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Longzhong Strategies exactly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the whole, anticipates that the whole country would be trisected in the future and put forward the means to realize the trisections and a long—range task of "resuming Han dynasty". All these are successful strategies, but "occupying Jing and Yi" is the biggest error among the strategies.

Key words: Three Kingdoms; Zhuge Liang; Longzhong Strategies

(责任编辑: 陈道斌)